



簡宏哲·蕭至邦·劉鶴群·林家緯

壹、前言

吾輩皆知，社區工作與個案工作、團體工作並列為社會工作三大方法，亦是較晚形成認可之社工專業。而臺灣社區工作及社工專業發展，更與社區發展政策如血濃於水般密不可分，雖然推動過程脫離不了當時為政治服務的背景環境（林萬億，2011：2-17），如今在全球化與資訊化的潮流，臺灣社會變遷同時受到國際社會的多元影響，若不能究其歷史脈絡，亦無法耙梳臺灣社會福利政策與社工專業的發展根由。另外，社工專業建構過程也遭遇到不同課題，比如東西方的社工教育與文化霸權、經濟壓迫、少數族群、公民權利、民族主義的交互作用等問題，還有社工教育、實務與理論運用的本土融合及修正問題，以及政策立法與社工專業、經濟發展與社會福祉的關聯性等諸多發展（鄧紅風譯，2004；宋麗玉等，2010；呂寶靜編，2011；李明政譯，2012；羅秀華譯，2012；

陳穆儀、施怡廷、郭嫻好譯，2013；汪琪，2014；林勝義，2016；黃琢嵩、鄭麗珍編，2016）。

本文認為，從國際社會變遷到臺灣社會福利政策推動與社工專業發展間，有其必然的因果關係，如何理析貫穿其中的普遍觀點，以利國家政策、社工教育與實務工作的共同進步與推動，做為兼顧臺灣本土社會工作研究與人民權益保障的實務基礎，絕對是國家福祉建設跨專業領域的優先任務。本團隊嘗試從社區發展的歷程，結合社區工作目標，強化社工專業如何與社區工作發展共同深化，同時保障社區居民與服務對象的權益來討論，並引用國際人權發展的觀念導入，得以彰顯在社工專業的實踐意義，及對社會福利、政策教學進行實務與教育上的反思。當然，上述議題過於龐雜，雖無法單純以社工專業來論述，在暫無相關整合資料可以參考下，僅可能朝向本土實務觀點的操作經驗來說明，這是本文限制所在。

貳、臺灣社區發展、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之發展

二戰後的臺灣在國民政府接收後百廢待舉，1950年代透過聯合國以推動社區發展名義的協助下，秉承國內外各種社區組織運動經驗與國際援助，臺灣開展了不同階段的社區發展工作歷程。而國共戰亂後國民政府遷臺，誓將臺灣打造成三民主義模範省及進行政治反攻，基於戰時及治理需要，於1957年完成省府疏遷中部及中興新村的建置計畫，至此省府體制的確立，才是奠定臺灣大力建設的發展根基（陳胤宏，2007）。而臺灣推動社區發展工作基礎，有其華人傳統文化的社會底蘊，如中國歷代民間互助結社活動，指社倉、義田、鄉約、會館及團練（蘇景輝，2009：67-68）的地方運作；且在日治時期所推動的社區組織工作，有人類之家、鄰保館、社會館與方面委員會（賴兩陽，2009：98-101）；還有中國近代的晏陽初及梁漱溟先賢，所推動的鄉村運動與平民教育做為社區發展的典範（徐震，2007c：402-421；李易駿，2015：68-70）；同時受到西方社會福利發展的刺激，從歐美國家慈善組織會社的興起、社區睦鄰運動的擴散所啟發（林萬億，2013：90-117），進而形塑臺灣社會福利政策與社工專業發展之環境。而早期臺灣的社會工作與福利政策之成形，起初是為了當權者的政治對抗所需要，不僅要排除政府統治的障礙與所謂的皇民化遺毒，更提升國家統治的合法化，對外亦有政治宣傳

的積極效果（林萬億，2011：2-6）。但在國際局勢與兩岸對峙的限制下，反攻已是無望，政府的國家政策也被迫趨於務實，如何建設臺灣並穩定民心便成首要之急。

臺灣省政府開始推動社會福利及基層建設，半個世紀來以社區發展政策影響巨大（邱汝娜、李明德，2005：136-138；徐震，2007d：230-258；賴兩陽，2009：102-108；林萬億，2011：9-10；李易駿，2015：50-80；簡宏哲、林家緯、蕭至邦，2016：191），從1965年行政院公布「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將「社區發展」列為施政項目，同時述明「僱用曾受專業訓練之社會工作人員，負責推進各項工作」，接下來1968年擬定「社區發展工作綱要」，這是執行社區發展政策明訂的依據，亦是奠定臺灣以社工專業，推動社區發展及累積社區工作經驗的政策基礎，同年省政府訂定「臺灣省社區發展八年計畫」（後改為十年計畫）；而內政部於1967年擬定「中華民國社會建設第一期及第二期計畫」，內訂定建立社會工作人員制度，並於1971年通函省、市政府編列社會工作人員名額，但真正法制化與專業建立之倡立，則在行政院於1976年通過「中華民國臺灣經濟建設六年計畫」第六章建立社會工作人員專業制度之決策，同年內政部於12月訂頒「當前社會福利救助業務改進方案」（伍）建立社會工作人員制度之規定；依據上述發展沿革，1979年省政府訂頒「臺灣省推行社會工作人員制度計畫」，其目的為推行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建立社會工作人員專業制度，在各縣市設置社會工作人員，運用

社會工作專業知能，協助預防及解決社會問題，工作項目以家庭成員、青少年及老人為服務對象，同時強化民眾認識社區及社區發展方案的推動，配合地方實際需要，協助其他福利服務事項（註1）。

從過往的發展歷程來看，聯合國所推動的社區發展方案與臺灣在地經驗，正是我國社會福利政策及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的基石。而1960至70年代，亦是臺灣社區發展工作大力推動的基礎時期，此階段的經驗為後來的社會（社區）福利服務體系、社區照顧（福利社區化、長照推動）模式、社區營造（六星計畫、新故鄉社區營造、社區總體營造、社區健康營造）、農村再生計畫等政策推動，奠定良好的發展基礎（簡宏哲、蕭至邦、陳茂祥，2016：215），也讓社會工作者藉由社區發展之機遇，深化社區工作的實務專業。

參、臺灣社區發展與社區營造中社會工作之角色

一、社區政策影響社區組織的變遷歷程

檢討我國推動社區發展的經驗並非沒有缺失。因1960-70年代處於戒嚴時期，並不允許自主的社會力量，因此社區發展政策的推動是政府由上而下全面主導，政府選擇特定社區並鼓勵推派社區理事組成社區理事會，補助經費主要推動公部門界定的建設項目（曾旭正，2014：17）；且因長期戒嚴與黨國體制影響社會發展所致，造成民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度不足，由下

而上的自主意識薄弱，讓社區發展多以政策指導要求基層配合，在硬體建設上成效頗佳，但社區意識的促發難有成效（蘇景輝，2009：71-79）。由於社會變遷及群眾意識抬頭，社會運動事件屢屢發起，長達38年實施的《臺灣省戒嚴令》，也於1987年正式解除。從1980年消基會的成立，宣告組織化社運的正式起步，解嚴當年即出現政治敏感性的勞工、農民、老兵權益、政治受刑人人權、外省人返鄉、教師人權和福利弱勢團體抗爭等特定受害者人權運動（何明修、林秀幸編，2011：v-viii 蕭新煌序）。而臺灣的公民社會與民主政治的演進，幾乎與社區發展及社區營造的推動進程如影隨形，促使公民意識與社運事件在其中不斷激盪交集，喚醒人民的公共參與，學者曾旭正詳述過程（2014：5-18），本文整理及說明發展色彩如下：(1)60-70年代戰後社區發展於戒嚴時期，基於統治需要限縮人民自主的力量，以達到國家政經穩定發展目標，從社區理事會改組至政策引導的社區發展協會，成為村里辦公室以外的公共建設管道，也引發臺灣地方派系與政治對抗的衝突戰場；(2)80年代解嚴後，人民藉由「生存及認同危機」、「對生活環境品質不滿」，過往未曾凝聚發生的社區意識開始蓬勃，對社會全面鬆綁而蘊生的社會（社區）運動，讓民眾在其過程中重新質疑，原本習以為常的國家權力關係；(3)90-2010年代的社區協力政策透過社區總體營造方式，逐漸擴大為國家計畫的推動，創造權力下放、集體參與和創意行動的民主潮流；(4)政黨輪替後的2010

年通過農村再生條例，讓原本主導社區營造的文化單位欲振乏力，社造重點轉移至農村社區，其成效亦受到質疑，但可顯見執政黨如何影響社造政策，達到政治操作社區，對其發揮管理或治理目的。

綜觀國內有關社區發展至社區營造的政策推動，可以發現戰後戒嚴時期的社區發展，雖然人民受到國家權力的限縮，但也因為政策引導及政治操作，埋下人民透過社區組織及社會團體，向政府爭取建設經費的種子。解嚴後，原本 1983 年訂頒的「社區發展工作綱領」中有關「由居民每戶代表選舉組成社區理事會」等規範不合時宜，內政部於 1991 年重新頒訂「社區發展工作綱要」，以人民團體法為母法，要求成立社區發展協會取代原有的社區理事會，至此政策性的社區運動團體，轉型為人民可以參與集會結社權利的社區組織，也讓臺灣從過往政府極力單向主導的社區發展政策，轉向公私協力兼以多元發展的社造模式。有學者從 2000 年以來的研究（蔡政文，2011：18），肯定臺灣基層政治壯大的理由，在於(1)民間公益力量活力強大，參與跨國活動的非政府及非營利組織積極活躍；(2)民間文化創意產業及文化活動蓬勃發展，同時推動民主、人權的民間團體快速成長；(3)人民捐贈及參與慈善公益活動熱心積極，民間團體及個人的自我期許與認同高。所以，近年來內政部體察國內外政治、經濟、社會環境大幅改變，公民權利與人權意識備受重視，也逐步檢討人民團體法，研議將社會團體的輔導與管理，由現行「許可制」改為「備查制」，

大幅鬆綁人民結社權，使社會團體的會務，回歸團體自主、自律的方向，落實公民社會的理想（李美珍、王燕勤，2016：7）。

二、社工專業與社會營造運動為一體之兩面

1960 年聯合國出版社區發展與經濟發展（*Community Development & Economic Development*）稱社區發展是「一種過程，即由人民以自己的努力，與政府當局的配合一致，去改善社區的經濟、社會、文化環境。在此一過程中，包括兩種基本要素：一是由人民自己參加自己創造，以努力改進其生活水準；二是由政府以技術協助或其他服務，助其促進發展更有效的自覺、自發與自治」（註 2）。綜看臺灣社區政策到社工專業的建構歷程，其關聯性以徐震（2007ab：56-77）研究「重物的社區發展」觀點來引申，其提到應用「倉稟實而後知禮節，衣食足而後知榮辱」的說法（註 3），及心理學家馬斯洛人類需求層次遞增理論，我們瞭解戒嚴時期的社區發展環境有其政治需要，乃是透過國家控制的手段（由上而下）來穩定社會發展，而物質建設滿足人民基本的生活需要，普遍為當權者及民眾所接受的方式，所以戰後至戒嚴解除期間，稱為臺灣社會基礎重建時期亦不為過。但重物不代表沒有重人，只是重人在此階段，人民的權利與自主性被控制在不能產生「不利於政府統治」的狀態，故早期社區發展的公共設施、生產福利與精神倫理等建設，都是圍繞在此意旨中推動。不過徐震也批評「重事物的建設與忽視人

的參與」實為今日許多社區，不能持續發展與未能維護其建設成果的主要原因；而「重人的社區發展」強調增進居民的自治能力，並從社區的組織與教育入手，著重居民的參與及改變生活態度，有助基層民主發展與國家文化建設，但偏重文化教育活動而失空洞，更要有專業領導，但改變居民的成效無法立竿見影，從政策績效來看較不討喜。但解嚴之後，人民不滿足於基層物質建設的成效，更因為各種發展建設所帶來的環境破壞及追求集體生活品質的更佳權利，臺灣開始朝向人民參與公共事務的社會發展，也才有後來的社區總體營造的浪潮。

李丁讚（2014：29-31）亦提到，社區營造的基本理念，乃是嘗試透過「物」的營造，進而改造「人」，讓人變成一個「公民」，這裡的「物」是指社區公共事務，藉由公共事務參與，本身就是一種教育過程，社區營造就是要創造民主場域，讓「人」可以置身其中被轉化為「公民」。所以，徐震（2007b：74-77）曾提到有關社區發展的「重人」或「重物」工作模式，要有互補結合的策略，認為物的發展屬於工作的內容，人的發展繫於工作的程序，必須將兩者結合同時並重，始能達到社區發展之目的，期能提供「以人成物」及「以物養人」的工作模式。以上兩位學者所論，亦符合以下社區工作價值理念，包括：(1)尊嚴和價值；(2)公平與正義；(3)民主及參與；(4)關懷與責任；(5)學習與合作（黃源協、莊俐昕，2016：155）。我國從社區發展到社區營造經歷半個世紀的演變，所延

伸的不同社區概念之比較，舉凡社區工作、社區社會工作、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社區總體營造、社區規劃、福利社區化或社區照顧等定義，就社會工作觀點來看，審閱社區領域相關研究（莫藜藜編，2007；蕭家興，2008；蘇景輝，2009；賴兩陽，2009；葉至誠，2010；林勝義，2011：2-20；蔡宏進，2012；林萬億，2013：546-608；李易駿，2015：1-47），本文認為各種社區政策與不同工作方法之興起，包含社會運動在內，都是一種追求集體福祉的社會營造過程及時代變遷下的產物，也反應出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的相互創造。再觀社會工作專業的實務內涵，歸納出7項操作性定義，其中3項為：(1)提升整體的社會福祉；(2)對人權與正義的倡導和維護；(3)對於差異的尊重和接受（萬育維譯，2012：18-20）。另國際社會工作者協會與國際社會工作學校協會（IFSW/IASSW,2004）的宣言表示，社會工作之核心即是人權與社會正義，並有三項基本總則：(1)尊重全人類之尊嚴與價值；(2)促進福利或福祉；(3)促進社會正義（引自周采葳譯，2014：58-64）。以及美國社會工作人員協會（NASW, 1999）於社會工作倫理守則規定「社工員挑戰社會正義」，要求社工為遭受貧窮、歧視或其他受到不正義對待的弱勢族群，追求社會變遷；重點在努力提升危機中弱勢族群的權力，使他們能夠影響他們自己的生活（引自曾華源等，2011：111）。綜上可證，社會工作要求關注弱勢與社會正義的維護，而社區工作雖強調集體成員的共同利益與問題解決的發展（註

4)，但更離不開對社區弱勢者的權益保障（簡宏哲、蕭至邦、陳茂祥，2016：223）。

本節所論，認為臺灣社區發展到社區營造的轉變，是與時俱進的公民社會及民主發展的集體社會運動與營造過程，而社會工作與社區發展政策的演進乃一體兩面，雖以關懷人民福利需求為重要宗旨，但並非僅侷限於社會福利（政策）的專業服務，而於社區營造或社會運動範疇，自我退出該舞臺，喪失與不同專業領域合作的角色與發展機會。本文認為，社會工作在臺灣的發展，除了深化社會福利層面的人權與社會正義，面對全球化、多元化與專業化的聯結，必須關注於服務對象的共同權益及差異化需求，同時瞭解社區組織、社區工作與社會團體的動員及實施方法，要求專業工作者嘗試走出機構範疇，深入社區基層與擴大社會關係的接觸。而運用社會工作觀點加以整合不同領域，但擁有共同助人專業價值的社區工作方法，更是有能力回應社會快速變遷及促進個人、集體對象等正向發展的社會工作模式。

肆、人權發展對社會（社區）工作專業深化的啟發

社會工作是西方工業化經濟發展與社會福利推動的產物。社會工作透過關照弱勢者的福利層面需求，來伸張其社會公平與正義，而弱勢者是缺乏經濟、政治和發展機會而處於不利的社會地位，相對更加需要依賴於社會與國家的支持。而社會工作起源於社區問題的解決，故社區工作對

弱勢的個人、家庭或特定群體提供專業服務，更是維護人權與社會正義的發展工作。臺灣由於特殊的兩岸關係，參與國際事務處處受到打壓，一直處於不利的局勢求生突破，我國自許為民主發展國家，絕不自外於國際社會而特立獨生，如臺灣在參與國際人權議題上亦順應發展，不僅接軌民主潮流，更積極謀劃如何落實於政策上的推動。從當代國際人權發展史的角度來看，與「世界人權宣言」共同被視為「國際人權憲章」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無疑是本世紀人權發展的重要里程碑（林良榮，2010：49-50）。雖然我國退出聯合國而無法完成兩公約的簽訂與批准程序，但仍於2009年的立法院完成三讀程序，並制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註5）。由於國際二公約已成為普世人權範疇，對於各國社會福利政策制定與社會工作專業發展，有其深遠之影響。

故社會工作的實踐離不開人權發展，尤甚關注弱勢者人權，但社會工作如何依據弱勢者人權的理念，來進行其具體協助及各種發展，學者蘇景輝（2010）乃依「世界人權宣言」、「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等三個人權文件，進行整理分析與回應，有以下重點：(1)社會工作者主要服務及實踐對弱勢者的人權保障並加以瞭解，並為積極倡

導辯護，以建構良善的環境及防止問題產生，與獲得解決的制度性辦法；(2)社會工作應透過倡導、社會行動、充權的整合策略與運用，為弱勢者遭受不公平對待，而採取相關的社會行動。李明政（2016：216-218）從原住民族社會工作教育進行反思，認為社會工作立基於正義之規範性專業，承認人權價值及專業分工的定位，可視為維護弱勢者人權的專業，並努力促使弱勢者獲有適切的生活條件及自我尊嚴之維持。林勝義（2013：384-390）也認為臺灣社工學術界對人權議題的論述不多，實務上對維護案主人權的行動不夠積極，他提出了一些啟示：(1)著重經濟與社會權之外，不能忽略公民與政治權對落實人權的負面影響；(2)易受傷害的案主通常是人權的受害者，應該列入社會工作評估及處遇的焦點；(3)加強人權與社會工作的訓練，以強化社會工作者在人權維護的專業角色與行動。近年來國際興起的發展性社會工作取徑，其特質在於將投資策略運用於專業實務中，重視以社區為本的實務干預，以及如何有效動員社區支持，有力的倡議社會變革，同樣以人權、和平與社會正義為整合元素（羅秀華譯，2012：15、227）。Conley（2016）認為：「發展性社會工作介入支持能力發展，使接受介入的對象有能力參與經濟及社會，並有三個核心原則：介入為優勢取向、利用資產與能力、促進增權益能，以改善社會和物質化的福祉」（黃琢嵩、鄭麗珍編，2016：28）。

從社會工作關注弱勢者人權與社會正義的實踐，不論服務對象是個人、家庭、

團體或社區，其影響是錯綜複雜的，對於處於缺乏經濟、政治和發展機會的弱勢者，單從問題取向的直接服務或專業協助是不夠的，必要時應從社區關係或社會結構的層面進行工作。而傳統的社會工作常被批評為國家權力控制的工具，置身情境中的社工人員，還要面對現代化、經濟化及市場化與管理績效的要求，讓社會工作及其服務者，成為福利資源的分配者，若是回到社會工作的價值與信念，必要站在弱勢者的立場與受壓迫處境，回頭來反抗這樣的供給體制，但這種結果對於社工發展與國家權力的平衡是矛盾且對立的。而社會工作的本質與目的，確實是透過國家社會的資源運用（包含法律、教育、知識、經濟、政治、倡導等各種資源的聯繫與開發），幫助社會整體權利的向上發展並保障個人基本權益的維護，這本身是處於國家社會的權力及政治關係之中，如何不影響政治利益與機構宗旨，同時又保障社工的核心理念，是無可迴避的專業挑戰。因此，在專業職責與政治議題間，社會工作須建立一個很好的平衡，為促進改變以滿足社會工作的政治理想，採取集體性的取徑是必要的，以及政治脈絡下的社會工作，包含：(1)社會工作者對於自身立場的審慎思量；(2)對於人權相關議題的覺察及行動參與；(3)透過專業機構來投入工作，及與其他組織合作（李明政譯，2012：70、136）。Iain Ferguson 認為：「要重新正視社會工作具有政治實踐的本質，要在困境下有所作為，需要極大的勇氣、批判的視野、堅定的信心及組織動員，社會工作將不再是沉

默的專業」(陳穆儀、施怡廷、郭姍好譯, 2013: 220-221)。

社區工作做為關注集體弱勢者與特定群體權益的社會工作方法,更能比個案、家庭及團體工作方法,採取組織動員、培力參與及資源連結等方式,進行倡議及促進服務對象的自我成長及環境改變。葉至誠(2010:4)特別說明:「社區工作是強調以社區為對象的專業服務工作,透過組織居民參與集體行動,去釐訂社區需要,合力解決社區問題,改善生活環境及素質;在參與的過程中,促使居民建立對社區歸屬感,培養自助、互助及自決精神;加強居民的社區參與及影響決策的能力和意識,發揮居民的潛能,培養社區領袖才能,以達致更公平、公義、民主及和諧的社會」。但是要如何達致上述的社區工作定義,新時代的社區工作方法,要有新的思維與應變觀點,更要有跨領域與不同專業合作的整合能力,以達成作為綜融性社會工作者的基本角色,如諮商者、團體催化員、調解者與協商者、經紀人及協調者、教育者與發動者,更是充權者與倡導者,還有行動者、研究者及公眾發言人等(林萬億,2013:57-60)。所以,隨著社會多元發展,社區工作如何實踐出社會工作使命與意義,能夠有效的運用各種社工專業及社會資源,不僅可以在機構中工作,也可以在社區中與個人、家庭及團體或組織居民共同參與服務工作,以促進改變及發展社會福祉,才是我們要持續耕耘及努力的。

伍、發展出能與人權觀點與在地實務對話的社工專業

林萬億(2010:5)說明,臺灣的社會工作與社會福利是分開的兩門課,社會工作談專業方法與實施領域,社會福利談福利制度與服務方法,但是兩門課必須關聯在一起,否則專業方法與實施領域,無法落實到人民的現實生活中。林勝義(2016:5)在社工教學過程中,體悟臺灣社會工作專業的養成教育,偏重實務層面而較忽略實務運作的法規依據,還有對於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的探討,也專注於法規條文的解讀,較少思考法規與政策之間的關聯性,及社工專業在其中應有的任務。萬育維(2012:v)也曾提到臺灣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缺乏:(1)與實務經驗的對話與反省;(2)跳脫出西方殖民的意識型態;(3)走出學院派的階級意識,因為實務與社工教育被認為是脫勾的,教的人不一定會做,做的人不一定能教,彼此成了兩個世界。吾人認為,當今世上學術發展百家爭鳴,各種理論及觀點,隨著社會變遷與問題解決的需要而層出不窮,臺灣學術研究及各領域學科之發展,也承接西方的專業殖民及麥當勞化的腳步來演進(註6),但是在西方理論的引導下,同時也被置入外來情境背後的社會文化思考模式,而忽略了該模式所創造出來的專業體制,是如何的影響教育者、受教者、服務者及被服務者。面對外來專業建構於臺灣本土實施下的社會工作,是否有水土不服或是自我殖民化的現

象，以致於失去自我反省與檢討的積極性，產生外來理論與本土實務的斷層，比如當專業工作者對社會工作的起源發展、助人技巧可以侃侃而談時，卻不一定對社會（福利）救助規定、法律協助等有更進一步的瞭解；或者知道各種行政程序或法令規定，而無法針對服務對象或特殊境遇的個別需要，彈性辦理或變通協助。因此，社工教育如何在政策、理論及實務上，獲得東西方經驗與專業的整合，有賴於課程教學的變革與貼近在地的學習精神，不僅學生要向老師學習，老師也要透過學生的學習過程，一起向服務對象共同學習。

顧瑜君是花東地區透過「社會參與」課程，進行「大學小革命」的推手之一（註7），她嚮往湯恩比館大學睦鄰運動的理念，將社區當作學習的對象，把大學當成社會責任的實踐場所，以大學為基地及鄰里地緣為基礎，讓師生們參與鄰近的社區改造工作、當地的各種運作並促進居民的生活改善，同時培養社會正義價值（顧瑜君、林意雪，2012：5-9）。另可借鏡律師吳旭洲（2006：26-29）從法律維護層面討論弱勢人權，並跳脫法律的領域，嘗試用更貼近社會的角度，來觀察社會上所發生的事實，並提出面對弱勢族群應有的態度值得參考，如：(1)社會資源有限，應作更合理、公平之分配；(2)關懷弱勢人們真正之需求；(3)人性尊嚴具有至高無上的價值，不能以任何目的來取代；(4)提供弱勢族群足夠的資訊及支援。我們應當正視，社工理論多半是從西方傳入的，如何將西方理論應用到華人的社會文化中被連結起

來，讓社工學生能夠連結課室所學和實務工作所需，裝備他們離開學校進入實務環境時，有能力發揮社工專業角色，這是社工教育工作者不斷反思和探究的課題（梁麗清、陳啓芳，2008：viii）。正如致力推動社會工作本土化的中國學者衛小將（2015：221）所言：「我們需要真正立足於民眾需求、地方習慣和實踐知識來發展社會工作」。

由於人權議題直接受到國際局勢與民主發展的影響，不僅形成普世價值，各國也透過各種立法及政策的落實，來保證國家對於社會公平與正義，得以被實現在每位國民身上。但是，如何不落入長篇大論的文獻探討，而能夠從國際局勢的變化，各種公約或規範的倡導，瞭解法律與政策形成的過程，包含特定價值的彰顯，並導引至專業實務的發展，契合民眾的需要，是學術研究及教育工作者要認真思考的。本文認為社會福利及社會工作的發展與人權議題的發展是筋骨相連的，面對繁雜多元的社會，社工教學應當幫助學生藉由不同的課程設計，導入對弱勢者人權議題的關懷，接觸三種層次的融會貫通，在宏觀層次，可以瞭解國際人權與國際社會工作發展脈絡及國內社會變遷，如何彼此影響社會福利立法與政策的建立；中觀層次，社會工作專業建立過程，與社會福利政策、行政工作的建立，如何影響組織或機構的經營及管理運作；微觀層次，社工專業如何藉由政策支持與工作方法，兼具社工價值的實踐與回應服務對象的需求，發展回饋政策與社工教育的實務機制。

由於社會工作關懷弱勢者人權與社會問題的解決是一體兩面，因為當有一人受到不當的侵害或壓迫，有可能是一個家庭或特定群體所面臨的共同悲劇。社會工作專業的建構，除了既有的價值理念，沒有法律、司法、政策、知識體系、工作方法的相互支持，是無法成為一門專業的，更重要的是社工專業不只是圈內人的專業，更應該是全民所認同的助人專業。社工專業的養成，不只是在學校、機構，更要在社區中被引領入門。人們生活在社區，服務對象也在社區之中，學校與機構都是社區重要資源，社工專業如何能不進入社區，獲取更多的養分來貼近現有的社會環境，發展出屬於在地、本土的專業服務模式。

陸、結論與建議

我們回到社工專業的本質，助人工作應當是發自內心、合乎人性及公平正義的，助人專業的發展，不應孤立於象牙塔中而脫離社會。誠如廖義銘（2012：530）所倡議的社區正義論，他提到「社區正義不過就是重新珍重地看待在國家的法律，還沒有介入我們的日常社區生活前，那些我們為了維繫群體生活中必要的和諧，而從經驗中所獲得的各種待人接物之倫理與修維…簡單易行的社區正義，只要實踐即成就」。為了呼應本文主題的實務性及針對社工教育建言，有以下拙見提供參考：

1. 社工教育離不開社區場域，因為服務對象不是在機構，就是在社區中，而機

構也是社區體系的一環，機構服務沒有社區支持，信任與互動關係薄弱，無法建立認同感與居民產生連結的橋樑，社區資源的運用也就無法發展。因此，大學的各種社工課程應嘗試結合社區工作概念，請教師發揮創意，讓學生練習透過學校教學或方案規劃，把學校當成機構，建立大學師生與社區之間的服務&學習關係，不僅要接觸社區居民、瞭解社區問題，更應盤點及評估社區資源，並從實際行動過程中，看見社區議題與弱勢者需求，進而產生方案設計或個案研討，導入三種層次的教學目標，以建立學生先行體驗，未來進入社區服務個案的生活（工作）情境。

2. 社會工作要有新思維，社工教育面對各種社會議題，都要鼓勵學生從課堂學習進入社會參與，在大學生涯體驗不同的社區環境，瞭解不同族群的生活遭遇及面臨的問題壓力，嘗試以共同參與的角色來理解同理心，不僅成為社區的一份子與獲得認同感，藉由親身體驗來驗證課堂所學，產生符合當地所需的解決方案及可能運用的工作方法，讓學生與居民透過課程設計，發展集體培力與行動參與的社區工作學習經驗。

3. 人權議題無法自社會工作領域脫離，沒有關懷弱勢者權益及強調人權的社會工作，就不是社會工作，但是社會工作不僅對個人工作，也對集體對象工作，所以如何培養出有專業且綜融的社工人才，讓個案、家庭及團體工作，都可以結合社區工作方法，建立彼此相互支持的資源網絡，以及知識能力共通的助人方法，不僅

可以針對弱勢者進行協助，也可以運用集體的力量及資源，來協助社工進行專業服務。

4.如何藉由以人權議題為核心，讓社會工作教育結合法律政策、行政管理、組織營運、人力資源、工作倫理等專業領域，藉由機構實習、方案設計、服務學習或志願服務等方式，融入社區工作的社會參與，幫助學生透過不同議題的瞭解，反思社工教育的不足，以提高助人知能的視野，強化觸類旁通的學習能力，也裝備更多的服務技能。

最後，本文拋磚引玉，強調面對臺灣改革變局的社會工作，應當以社區工作為發展基礎，社區工作不僅注重個人，也關注群體的公平正義（註8）。我們認為，社會工作再度重視人權價值與弱勢者權益的時機已經到來。近年來面對都市更新及農民運動、死刑廢除、同志婚姻權益修法、長照十年 2.0 的推動、社會住宅與居住正義、文化資產及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衝突、日本核災食品的開放與否、社區產業與社會企業等議題層出不窮，但都與社區

正義及人權問題息息相關，甚至從上述引起的社會運動，都是當代社會工作無可迴避的社會變遷，也無法單從社會福利層面來解釋與介入。傳統的社會工作方法與機構服務模式及學校教育的知識生產，在實務與理論之間的整合，已難以回應快速變化的社會需求。故社區工作正是建立社會安全網絡的第一線，便是藉由社會工作方法，喚醒社區居民的互助意識，重新建立社區倫理，強化資源整合與開發，回應臺灣社會環境，發展屬於本土的社工專業，不僅在社區發展與社區營造之間兼容並蓄，更要能夠面對不同的社會議題，尤其是觸及人權議題時，可以挺身而出的回應參與，彰顯社會工作的意義與價值。

（本文作者：簡宏哲為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社區工作者；蕭至邦為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劉鶴群為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主任、副教授；林家緯為逗陣社會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社會工作師）

關鍵詞：社區工作、社會工作教育、弱勢者人權、社區發展

註釋

註1：除前述的文獻探討外，有關臺灣社區發展推動過程，可參考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社區發展）網頁的歷史資料

http://www.mohw.gov.tw/CHT/DOSAASW/DM1.aspx?f_list_no=113。

註2：本段有關聯合國推動社區發展說明，其詳細內容可參考中華百科全書網路版（條目－社區發展）<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data.asp?id=1934>。

註3：這是管仲的名言，但是實際上並非如此，比如有「江山易移、本性難改」，或者「仗義半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的說法，可以表示人類的行為並非只是受到

社會環境影響，個人天性或是家庭環境所塑造出來的性格，都有可能影響需求層次的排列順序，而有不同輕重的個別差異。在本文是爲了論述說明，而引用徐震教授的說法。

註 4：此項可參閱以下文章第二節關於社會工作觀點的社區工作論述：簡宏哲、蕭至邦、陳茂祥（2016）。發展專業信念的社區工作者，推動有效的社區發展工作。社區發展季刊，154，215-226。

註 5：可參閱法務部網站有關（兩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

<http://www.humanrights.moj.gov.tw/lp.asp?CtNode=32913&CtUnit=12352&BaseDSD=7&mp=200>。

註 6：麥當勞化（McDonaldization）是指一個社會經歷著速食餐廳之特色的過程，由社會學家喬治·里茲（George Ritzer）所發明，提出了四個麥當勞化最主要的元素：效率（Efficiency）、可計算性（Calculability）、可斷定性（Predictability）及控制（Control），詳細內容可參閱：George Ritzer（原著）、林祐聖，葉欣怡（譯）（2002）。《社會的麥當勞化》。新北市：弘智。

註 7：東華大學顧瑜君及林意雪等多位教師，於 96 年透過教學卓越計畫進行「社會參與式主題課程改進教師社群」方案，在課程方案執行的 5 年期間，共有 25 位教師參與，橫跨 4 個學院，正式與非正式的課程累計 38 門課，參與學生超過 1,520 人，內容有弱勢照顧、協助社區建立特色、原住民部落協助、挑戰學生自我成長和海外志工等，主要透過老師們的共同實踐，共同探究如何帶領學生走出教室，從實際行動中釐清參與社會與社區的價值與真意。詳細內容可參閱：顧瑜君、林意雪（策劃）、東華大學教學卓越中心社會參與教師社群（編著）（2012）。教育小革命：大學生的十堂社會參與課。臺北：心靈工坊文化事業。

註 8：本期的季刊主題是《國際公約與臺灣社會福利發展》，國內有能力在此大方向論述及引經據典的學者不少，但本團隊認為回歸季刊的初衷，仍要盡可能導入社區發展與社工專業的層次來討論，並對實務工作有所貢獻，以利臺灣本土社會工作的持續建構。這是本文未從國際公約如何由上而下影響臺灣社會福利發展來論述，而是反過來由臺灣的社區政策發展，由下而上的觸及國際社會工作與人權議題的思考，期望未來有更多理論與實務結合的論述被生產出來。

參考文獻

何明修、林秀幸（主編）（2011）。社會運動的年代：晚近二十年來的臺灣行動主義。臺北：群學。

- 吳旭洲（2006）。漫談弱勢人權之法律維護。律師雜誌，321(6)，21-30。
- 呂寶靜（主編）（2011）。社會工作與臺灣社會。高雄：巨流。
- 宋麗玉、曾華源、施教裕、鄭麗珍（2010）。社會工作理論－處遇模式與案例分析。臺北：洪葉。
- 李丁讚（2014）。〈社區營造與公民社會〉，收錄於：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策劃）《落地生根：臺灣社區營造的理論與實踐》，頁 19-40。臺北：唐山。
- 李易駿（2015）。當代社區工作－計畫與發展實務。臺北：雙葉。
- 李明政（2016）。思考原住民族社會工作教育。社區發展季刊，155，215-224。
- 李美珍、王燕琴（2016）。跨越半世紀－社區發展 5.0。社區發展季刊，154，6-17。
- 汪琪（2014）。邁向第二代本土研究－社會科學本土化的轉機與危機。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林勝義（2011）。社區工作。臺北：五南。
- 林勝義（2013）。社會工作概論（五版）。臺北：五南。
- 林勝義（2016）。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兼論其社工實務。臺北：五南。
- 林萬億（2010）。社會福利。臺北：五南。
- 林萬億（2011）。〈臺灣社會工作的發展歷史〉，收錄於：呂寶靜（主編）《社會工作與臺灣社會》，頁 2-31。高雄：巨流。
- 林萬億（2013）。當代社會工作－理論與方法。臺北：五南。
- 林良榮（2010）。論「兩公約」之勞動基本權規範與實踐：從國際勞動法的觀點反思「兩公約」之批准以及對我國集體勞動關係之影響。臺灣國際法季刊，7(4)，47-85。
- 邱汝娜、李明德（2005）。政府社會工作人員制度的起初：參與者的回顧。社區發展季刊，109，136-141。
- 徐震（2007a）。〈社區發展二元論〉，收錄於：莫藜藜（主編）《徐震教育論社區工作》，頁 56-67。臺北：松慧。
- 徐震（2007b）。〈社區發展的工作模式：重物乎？重人乎？〉，收錄於：莫藜藜（主編）《徐震教育論社區工作》，頁 68-77。臺北：松慧。
- 徐震（2007c）。〈晏陽初與定縣平民教育運動及其影響〉，收錄於：莫藜藜（主編）《徐震教育論社區工作》，頁 402-421。臺北：松慧。
- 徐震（2007d）。〈我國推行社區發展的回顧〉，收錄於：莫藜藜（主編）《徐震教育論社區工作》，頁 230-258。臺北：松慧。
- 國家教育研究院（主譯）、李明政（譯）（2012）。全球化與國際社會工作：後現代的變遷與挑戰（原作者：Malcolm Payne & Gurid Aga Askeland）。臺北：松慧。
- 國家教育研究院（主譯）、羅秀華（譯）（2012）。社會工作與社會發展－發展性社會工作

- 的理念與技術（原作者：James Midgley & Amy Conley）。臺北：松慧。
- 梁麗清、陳啓芳（2008）。知而行·行而知：香港社會工作教育的反思與探索。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莫藜藜（主編）、徐震（原著）（2007）。徐震教授論社區工作。臺北：松慧。
- 陳胤宏（2007）。遠離臺北：臺灣省政府「疏遷」之研究（1945-1960）。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 陳穆儀、施怡廷、郭姵妤（譯）（2013）。挽救社會工作：挑戰新自由主義與促進社會正義（原作者：Iain Ferguson）。臺北：松慧。
- 曾旭正（2013）。臺灣的社區營造（新版）。新北市：遠足文化。
- 曾旭正（2014）。〈從社區發展到社區營造〉，收錄於：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策劃）《落地生根：臺灣社區營造的理論與實踐》，頁 5-18。臺北：唐山。
- 曾華源（審閱）、周采葳（譯）（2014）。社會工作倫理與價值（原作者：Sarah Banks）。臺北：洪葉。
- 曾華源、胡慧嫻、李仰慈、郭世豐（2011）。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與倫理概論。臺北：洪葉。
- 黃琢嵩、鄭麗珍（主編）（2016）。發展性社會工作：理念與實務的激盪。臺北：松慧。
- 黃源協、莊俐昕（2016）。從社區工作發展新趨勢談社會工作教育。社區發展季刊，155，155-163。
- 萬育維（譯）（2012）。社會工作實務手冊（原作者：Barry Cournoyer）。臺北：洪葉。
- 葉至誠（2010）。社區工作與社區發展。臺北：秀威。
- 廖義銘（2012）。社區正義論－社區日常事務中之無知之幕及其治理問題。臺北：五南。
- 蔡宏進（2012）。社區工作方法與技巧。新北市：揚智。
- 蔡政文（2011）。〈國際關係理論與當前臺灣國際關係應有的研究方向〉，收錄於：包宗和（主編）《國際關係理論》，頁 1-24。臺北：五南。
- 衛小將（2015）。本土化與土生化：中國社會工作發展的檢視與重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鄧紅風（譯）（2004）。少數群體的權利：民族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和公民權（原作者：Kymlicka, Will）。臺北：左岸文化。
- 蕭家興（2008）。社區規劃學：住宅建築社區化之規劃。臺北：唐山。
- 賴兩陽（2009）。社區工作與社會福利社區化。臺北：洪葉。
- 簡宏哲、林家緯、蕭至邦（2016）。弱化的社會工作教育：談社區發展政策如何影響社區工作人才的培育。社區發展季刊，155，191-204。
- 簡宏哲、蕭至邦、陳茂祥（2016）。發展專業信念的社區工作者，推動有效的社區發展工作。社區發展季刊，154，215-226。

蘇景輝（2009）。社區工作：理論與實務。高雄：巨流。

蘇景輝（2010）。弱勢者人權與社會工作。臺北：巨流。

顧瑜君、林意雪（策劃）、東華大學教學卓越中心社會參與教師社群（編著）（2012）。教育小革命：大學生的十堂社會參與課。臺北：心靈工坊文化事業。